

李大钊与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美] 莫里斯·迈斯纳著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李大钊与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美〕 莫里斯·迈斯纳 著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 译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年·北京

根据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译出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美〕莫里斯·迈斯纳著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昌平东沙屯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 9.5印张 210千字

1989年8月北京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

ISBN 7-80023-088-0/K·135

定价：4.40元

中译本序

10年前，我在《努力提高李大钊研究工作的水平》一文中说过：“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所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是一本研究李大钊同志思想的专著。它对李大钊同志的思想分析得很细腻，特别注意反映其思想中特色的东西，使人看后颇有启发。这比起我们有些文章（包括我写的在内）那种‘大而化之’的毛病不能说不是一种优点。”此后，我虽几次想找我的学生把这本书翻译出来，终未如愿。1985年，迈斯纳教授在给 my 的信中提到：“大约十年前，两位日本学者将我研究李大钊的著作译成日文。”这就使我更觉得迈斯纳教授的书应该有中译本。恰好，谢荫明、侯且岸、姚樾三位青年也认为这本书有价值，决定译出来。小侯到我家，提及此事，我表示十分赞成。青年人做事快，不久即译出。我看了，觉得很好。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是给中国人看的，直译不行，而意译又容易走样。现在的译文既保持了原著的本意，又适合中国读者的文字习惯。译者对这段历史和李大钊的著作很熟悉，使译文没有出现什么差错。三位青年为中国历史学界作了一件好事，应该感谢他们。

迈斯纳教授把李大钊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联系在一起，并以此为书名，确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作者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是对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思想发

展的研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的研究。”更是真知灼见。李大钊是五四时代知识精英中的杰出者，是最先认识马克思主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思想家。他率先在思想界倡导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一批知识分子，使之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群体。他不仅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形成一些重要的认识。所以，研究他的思想，对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以及这个过程的特点，有重要意义。

迈斯纳教授在书中用很大篇幅想说明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非正统性，如第四章民粹主义倾向中，作者指出李大钊的“《青年与农村》和早期俄国民粹主义之间存在理性上和理论上的共鸣。”“它是运用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探讨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问题，准备一场知识界的新思潮所做的尝试。”又如第六章决定论与能动论中，作者认为李大钊是唯意志论者，指出“他坚持政治力量能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当他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与人的意志可以改造社会现实的信念协调一致的时候，紧紧抓住阶级斗争理论。但他“几乎完全脱离了社会经济分析，而集中在思想意识的论述上，同时又加上了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类似的说明，在全书的许多章节中都有。所谓“非正统性”，照我的想法，是否可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得出的结论，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原理未必一致，但并非脱离马克思主义，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是在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出现理解上和运用上的走形。我认为，这种走形最突出地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没有弄清楚，因而丢掉了生产力这一最终决定力量，认识一切问题仅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兜圈子。尽管

李大钊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时候，曾经认定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着理论上的矛盾，对马克思的决定论表示了保留性意见，但总还是比较忠实地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说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动因。但一到实际运用的时候，特别是在同持对立观点的人争论的时候，往往就有意无意地不再讲中国社会自身的生产力状况。由此出发，使相当不少的观点，出现不同程度的走形。我的这种说法，与迈斯纳教授的观点不尽一致，但所指内容却有很多是相同的。

对迈斯纳教授关于造成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非正统性”原因的分析，我十分赞赏。如他谈到李大钊的民粹主义倾向时指出：“不是俄国民粹主义的理论，而是过去那些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富有感情色彩的事迹感染了李大钊”。我觉得类似的倾向，不仅在李大钊的身上表现出来，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联系他们都忽视生产力，就感觉到李大钊和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被一种共同的意识，即长期居于中国社会主意识之一的农民意识支配着。他们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摆脱这种意识的影响。由于中国的民主革命不能不以农民作为主力军，尤其是在城市起义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只好派遣自己的先锋队到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方面固然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对农民进行教育，并可努力提高自身的无产阶级意识，但另一方面就更加大了抵御农民意识侵袭的难度，从而不可避免地使“非正统性”增长。

迈斯纳教授学识渊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近代历史也很熟悉。中国的研究者肯定可以从这部书中得到启发，进而取得更大的研究成果。当然，对于这部书中有的观点，我觉得还值得商榷。另外，某些史实也并不准确，但其责任

主要在我们。因为许多史实，过去中国学者没有把它搞清楚，致使迈斯纳教授无法依据准确史实进行分析。

三位青年要我为译出的这本书写序，不知写什么好。看了译本，发生一点感想，写出来，权为序。

张 静 如

1989年3月29日

序 言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时期结束于1927年。7年前，陈独秀、李大钊在他们的一小批忠实的学生追随者中，创立了弱小的共产主义团体，这些团体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以空前的速度迅速成长。19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富有战斗性的工人和学生组织、农民起义，以及沸腾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伟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参加和领导了这些斗争，并且从始至终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共产主义者早期的成功应当格外予以重视，因为他们的斗争发生在一个缺乏马克思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几乎完全不具备实现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物质前提的国度里。尽管如此，这些不足已经被中国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转化为积极的有利因素。这些缺少“辩证”观点的理论家们一般倾向于把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成功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1911年清王朝的崩溃，以及军阀分裂统治的动乱和接连不断的国内战争，使政治生活出现了真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主义者在以共同的策略因素为基础的，当时被称为“民族革命”的斗争中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即实现了第三国际倡导的与国民党的联合。但是不久，这种初步胜利又几乎导致了他们的毁灭。与孙中山的国民党结成的统一战线，为共产

主义者接近民众运动提供了机会。但是这个同盟的军事力量仍然牢牢地掌握在民族主义者手中。1927年春天，蒋介石决定付诸武力消灭他的共产主义同盟者，4月12日，上海突然发生了毁灭统一战线的武装政变，在这个中国中部的城市开始了镇压共产党人和工人运动的恐怖的血腥统治，几乎消灭了这个政党。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六天前，在北京，这场即将落到中国共产党身上的灾难，已经开始有了严酷的先兆。当时，北京处于既敌视共产主义者，又敌视民族主义者的军阀势力的控制之下，4月6日，中共北方党的领导人李大钊在北京苏联大使馆院内，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士兵逮捕。三个星期之后，他被秘密地处以绞刑，年仅39岁。

现在，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和最伟大的烈士受到尊敬。他不是中国的列宁，因为这个荣誉已属于毛泽东。但是李大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象征着老一辈东方民主主义者与新文化运动前期（1915—1919）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在后者当中，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脱颖而出，出现了新一辈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1927年后，他们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在中国共产主义者试图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的这个连续完整的链条中，李大钊正好是毛泽东之前的一环。

身为北京大学的历史教授和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是第一个声明拥护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的中国知识分子。他还以中国共产党两个主要创立者之一、以不幸的国共合作的主要设计者的身份著称于世。然而，就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来说，与其说他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治领袖，还不如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解释者。李大钊最先承担了把马克思主义

义中国化的任务，使它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不仅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且还对未来即将发生的变化作出预言。他的著作代表着我们时代最易引起争议的革命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解释与好战的民族主义的结合。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深深地影响着未来整整一代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他们中最杰出的一个人是1918年冬至1919年春这段关键的日子里，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年轻助手——毛泽东。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是对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思想发展的研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的研究。下列各章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哲学的世界观，是一种对历史和社会变革的说明，是一种革命的理论。尽管我有时把注意力放到李大钊在政治实践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分析方法之上，但本书不想对摇摆不定的“党的路线”和带攻击性的文章的任何细节进行研究，因为它们是与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和内部争论直接联系的。我们研究开始于这样的假设：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它的正确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推动历史的动力，它塑造和反映了中国的现实。进一步的假设是：中国共产党所运用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策略，是中共领导人用自己的方式和思路，领悟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本质的产物。至少部分如此。

这种研究是有道理的，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性经常出现问题。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正统观点的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社会环境所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似乎已经处于被曲解的畸形状态。

由此可见，在中国从未有过严肃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说法已经得到证明。为一个新的统治集团辩护的强烈兴趣，似乎比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做得更认真，理论解释得更完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被断言是实用主义的组织方法和贯穿整个思想体系的策略胜利的历史。而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被说成是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现在仍然还有这样或与此类似的说法，这些说法全都趋向于否认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明智的历史学家的正当事业，抹煞人们创造历史和人们的行动都是以他们的思想为基础的这样一个起码的常识。人们的意识和他们所生存的历史环境之间，存在着无数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思想的研究是探讨整个历史经历的许多方法中的一种，这种认识至少对于中国的历史来说是正确的。除非认为中国的现代历史是命中注定的，否则人们在确定目标，作出客观形势下所允许的主观选择时，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必须被认作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当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对中国的具体社会环境时，有三个互相联系的基本方面引人注目。在每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地融合于历史环境之中，理论和“客观”实际之间尖锐的对立趋向消失。首先，马克思主义原则中那些明显的和隐晦的变化被看作是20年代及其以后中国历史形势的反映。但是，这种变化绝不是中国客观实际的反映，它们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对实际的想象的反映——这些想象本身被观念中的马克思主义范畴所制约。

其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理论尝试，它试图对共产主义的政治实践作出解释，对朦胧的历史实际做出解释，以及按照马克思主义对隐匿着的中国共产主义实

实践的实质作出解释。然而，就思想体系而言，没有必要制造意识上的骗局。神话通常被认为是真理，这是因为它变成规范，从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最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看作是一种精神上的乌托邦——一种激进的，对历史、社会和未来前景的新的解释，它一直倾向于超越和改变现存的历史条件。这个新思想的实质是作为一种鼓舞的力量，服务于按照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政治行动。这个思想和目标在中国的形成过程是由各种各样现存的、文化和知识的因素决定的，同样也是由从事革命行动的实际可能性决定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目标和他们对中国的实际的想象，而这种对中国的实际的想象又修改了他们所运用的马克思教义的内容和这个教义提出的目标。

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历史，不仅要从中国的历史状况与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实质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方面研究，而且还要从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他特定的知识和感情倾向方面进行研究。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形成相同的模式，他们参加共产主义是由于各不相同的原因，遵循不同的途径：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不同的知识经历和倾向，对他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他们透过同样原则的棱镜着眼于中国的实际时，他们看到的是不同的画面。

以下篇章仅仅涉及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式。但是，李大钊所解决的问题，是所有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要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以及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与他同时期的图书馆助手毛泽东那里，在毛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上，引起

了特殊的共鸣。

莫里斯·迈斯纳

1966年9月于加利福尼亚斯堪

福社会学高级研究中心

目 录

中译本序.....张静如 (1)

序 言..... (1)

第一部 一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早年经历

第一章 早年..... (1)

第二章 革命的前奏..... (32)

第三章 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58)

第四章 民粹主义倾向..... (77)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与五四运动..... (99)

第二部 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

第六章 决定论与能动论..... (135)

第七章 历史哲学..... (166)

第八章 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 (191)

第三部 政 治

第九章 列宁主义与民粹主义..... (212)

第十章 民族革命..... (227)

第十一章 农民革命..... (251)

尾 声..... (275)

后 记..... (286)

第一部 一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 的早年经历

第一章 早 年

位于中国东北部的河北省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
地方，也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中心之一。公元前4—5世
纪，这里是著名的战国七雄之一——燕国的所在地，燕国包
括大略为现代河北的地域，它的首都就设在今天北京的位置
上。在这个从前燕国的东北方，在临近黄海的平原上，1888
年10月6日李大钊诞生了^①。

李大钊的少年时代正处于中国古老的社会制度进一步瓦
解的时期。垂死的清王朝，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打击下，处于
屈服投降的地位，极不体面地、蹒跚地步入它的最后20年。新
的经济力量正由海外冲蚀着这个古老的农业经济结构，加剧
了传统经济的危机。同时，由于这一变化，传统的统治方式
也面临着挑战。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先是改良主义者，接
着是革命者开始对清王朝发起最后的攻击，很快地使旧秩序

① 此处有误，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日。以下译者对原著中的岁数
及年份做了必要的更动——译者注。

完全崩溃。随着满清皇帝的退位，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官僚政治制度，留下了一个只有共产主义者才有能力填充的权力和思想体系的真空。

即使前清朝廷最后严密控制的、保守的河北省，也不能够逃脱新势力的冲击。1878年，河北省东部的唐山煤矿成为中国最早采用西方采矿技术的企业。西方的商业、宗教和教育的影响正在从天津这个通商口岸向着农村扩展。尤其是1900年义和团暴乱被镇压下去之后，西方的新学在河北省的学校里日益流行开来。

然而，古老的传统继续存在，中国人依然受到儒家教义的束缚，相信那些教义里有永恒不变的人类的生活理想道德价值和社会准则。孔子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汇集和中国历史档案中随处可见。李大钊年轻时深受中国历史传统，特别是战国时期英雄豪杰的传奇故事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许多提及这类乱世英雄的内容。他写的若干短篇作品具有屈原《离骚》的风格。《离骚》是公元前3世纪著名的诗章，屈原这位不幸的政治家在诗中充满激情地表露了他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和对曾放逐他的君主的无限忠诚。忠与孝的儒家观念，正是屈原英雄形象的特征。这一切培育了李大钊一种高度的侠义气质，一种强烈的民族爱国精神和为祖国为人民效力的迫切愿望。李大钊后来的生涯确凿地证明，这些中国的传统能够为激进的、反封建的目的服务。

李大钊出生于乐亭县大黑坨村，当他出生时，他的父亲年仅19岁，是一个地主。在李大钊刚满两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便去世了。几个月以后，他的母亲也不幸故去。20多年后，在东京的英文考试中，李大钊用不熟练的英语，在一篇名为《我的自传》的文章里描述了他童年时代的悲惨经历，

“当我刚刚两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去世了，第二年我的母亲又去世，丢下了一个十分需要她照看的可怜的婴儿。我没有兄弟和姐妹。于是我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但等我长到15岁的时候，他们又留下我孤独地生活在这世界上。我是多么不幸啊！”^①

尽管这篇回忆文章的语气是凄惨的，但这个没有父母的孩子的祖父、祖母相处得很好，他的祖父精心抚养并教育他。与一个年长而又非常溺爱他的监护人一起生活的经历，确实大大促进了李大钊个性的形成。在中国，如同在许多其它国家一样，祖父母和孙子的关系往往特别亲近、温暖，当父母不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可以想象一下，幼年的李大钊和他的祖父母之间被感情的纽带联结在一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联系使李大钊后来对老人和他们的传统表示同情，使他本人养成了热忱、豪爽的性格。在他开始步入成年的时候，他就作为“每一个人的朋友”而闻名于当时的知识界，后来又被他的北京大学的追随者看作是一个乐善好施的、慈祥的顾问。即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李大钊依然继续与许多非党知识分子保持着私人的联系，避免个人之间的争论，在党内宁愿扮演一个调和者的角色，而不是一个独裁主义的领导者。无论从哪一方面都可以看到李大钊的早年教育对他个性发展的影响。这也清楚的说明，李大钊的政治激进主义的根源必须在多种因素中寻找，而不能象一些片面的、简单的理论所归结的那样，人们之所以成为革命者，是因为他们处在与父母权威对立的地位上。

李大钊的早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尽管他并不是完全置身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114页。